

· 中外文選 ·

殷憂啓聖多難興邦

蔣經國

距今二十年前，總統蔣公在民國三十九年國慶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中，昭示我們：「今天國家雖是在艱難困苦，遭遇着有史以來所未有的國難期間，但無論在大陸，在海外，到處都蘊藏着中華民族偉大的生命之光，而自由中國反抗俄基地的臺灣，則正在燃起民族復興猛烈的火炬，光明燦爛，照耀在海內外每一愛國同胞的心靈上面。」我們又讀到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先生手著：「負重致遠」一書。值此民國五十九年國慶前夕，本誌特選載蔣副院長手著中之「殷憂啓聖，多難興邦」一節，俾國人猛省歷史的教訓，有以惕勵反攻復國的決心。並以此預祝勝利之期不遠，中華民族之復興在望，以副毋忘在苦精神。

編者

民國三十八年，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。共匪猖獗，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，那些『全軀保妻子之流』的軍政首長，大多昧於大勢，急爲私圖，脅迫 父親下野；以便向匪屈膝求和，苟保性命。父親寧靜忍耐，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，遂決然引退了。

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，父親引退，離開南京，臨行的時候，曾到紫金山 國父的陵寢謁別。當天晚上到達杭州，就住在寬橋空軍軍官學校。那時，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，可是，絕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份。第二天起來，精神還是愉快飽滿。一如平日。回到溪口故鄉

之後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，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。

記得 父親引退之後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，是希望空軍總部，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。那時，我們不明白父親的用意，祇能遵照命令去做。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，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，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；後來催得更緊，幾乎三天一催，兩天一催，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爲止。到了淞、滬棄守，纔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，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，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，而成爲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

兵力。如果不是 父親的高瞻遠矚，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，還會到臺灣來嗎？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，對於我們重建武力，將增加很大的困難；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，也許都成了問題。

初回溪口期間，外面對於與共匪談判和空軍非常濃厚，一般愚蠢的政客對「和談」都表示「樂觀」。更有一部分人過去以爲 父親是「和談的障礙」，現在認爲 蔣總統下野了，「和談」的希望極大。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匪俄鬭爭的經驗中，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匪的猙獰面目，對於所謂

「和談」，絲毫不感興趣。到了四月間，張治中，在去北平之前，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，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，到溪口來，向父親請示。父親接到電報後，就對我們說：「他來不來，無所謂。」第二天，張治中到了溪口，父親接見他時，對於「和談」的事，絕口不提，祇是邀同他去遊覽山水名勝。這樣便度過了大半天的時間。當晚，我就把父親料定「和談」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，他還不肯相信，說他「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」。張治中趕回南京之後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「和談」代表資格，一同飛往北平去「試一試」。那裏曉得，張治中這一試，就一去不返了。

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匪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「和平條款」，那簡直是一種「最後通牒」。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，前往杭州會商；見面的時候，父親就問他：「對於這個問題，應採取何種態度？」李宗仁回答說：「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。」父親說：「不必談了，過去共匪因為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，所以才同意和談，現在他們進攻的力量準備好了，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。同時，匪幫所提的「和平條款」第一條，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誣諸本黨，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，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！」父親說到這裏，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：「這一通電文，由我們兩個人聯名發出。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理總統的身份簽字，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簽字。」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：

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，和平談判已告破裂，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：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略，從明天起，政府遷往廣州辦公。」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，只好同意簽字；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，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「法統」挽救起來了。

就在四月二十四日，共匪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；父親囑咐我們說：「把船隻準備好，明天我們要走了。」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，父親沒有回答。我們只好準備一艘座艦，聽候父親的命令。那艘座艦的艦長，就是現任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。（編者謹按：黎氏其後曾任海軍總司令、參謀總長，總統府參軍長，現任駐土耳其特命全權大使）當晚黎艦長問我：「你知道不知道，領袖明天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，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：一是基隆，一是廈門。」黎艦長當時對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。

第二天，父親登艦後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——「到上海去。」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。那時共匪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，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，這時到上海去，簡直是重大的冒險。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，因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，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；而一定要在最危險的時候，到最危險的地方去。

父親到了上海之後，最初就住在復興島；以後感到此地離市區太遠，對於那些前來謁見和請示的人員，有很多的不便；不到幾天，就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，要搬到市區去住。我當時聽了

這話，立刻報告父親說：「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，市區內危險萬分，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？」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：「危險！你知道，難道我還不知道？」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，只好遵命辦理，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。在那兒，父親整天忙着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，同時，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，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。在每次講話的時候，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：「成敗在此一舉，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。」父親的苦口婆心，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。

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，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，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；那時，他不但滯留桂林，不到廣州處理公務，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，向父親「談條件」。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的黃金，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，建議最好「早日出國」。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，父親的內心沉痛，是不難想像的。因此用堅決的態度，給李宗仁覆信，大意說：「我要求我「出國」，這是辦不到的！因為我不是軍閥。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，這是可以答應的，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。」第二天，父親就離開了上海，然而座艦在定海附近，一連漂泊了十多天。此十多天中，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，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，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，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，共赴國難。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，才經過馬公到達了臺灣。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

中記道：

「今天的仇敵，是堅強、惡毒、兇險的共匪，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？祇有以新的精神，新的力量，新的生命，來迎接新的時代，奠定新的基礎。我舊的創痕還未癒，新的創痕又深了。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，怎能不揮淚前進？前進的這條路，誰都知道是困難的；但是不必害怕，這一條革命大路，已經由先烈用他們的血來鋪平了，我們今天要前進，莫退，莫退，前進！今天黑暗重重，危險艱苦，但我憑着一線希望的光明，及我對 總理的忠貞，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。」

這樣，如大海中孤舟，四顧茫然，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裏一燈微照；父親鼓着最大的勇氣，乘風破浪，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。

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，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。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，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，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。臨行的時候，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：『千萬要守秘密！』因為早已預料，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『和談』的條件之一。後來這一批黃金，是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。政府在播遷來臺的初期，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，財政和經濟情形，早已不堪設想了；那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？古語說：『無糧不聚兵，』如果當時餉糧缺乏，軍隊給

養成了問題；那該是何等嚴重？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後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，存放在中央信託局；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，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來，交給國庫保存。這一箱珠寶，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，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，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為保管的。因為我曾經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，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；所以，

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。當我到達上海以後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，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。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，飛到香港去，使我無法取出。我因向父親建議：『據所知道的情形，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，剩餘的東西，僅值二三十萬美金，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，同人家傷和氣。』父親却指責我說：『到了臺灣，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，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！』我聽了無言可答，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；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。

同年夏天，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匪，當時，父親正駐節廣州，曾詢問某一高級將領對於時局的意見；那位將領回答說：『時局已經萬分緊張，是否可以再試一試談和？』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：『你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收留像程潛、陳明仁這一班叛逆？說穿了，就是因為還有我在。』最後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：『要談和，你們去談，我仍舊要繼續奮鬥！』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鷄，面紅耳赤，內心慚愧，無地自容。

八月間，父親飛往重慶，去支持西南危局

，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談；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，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，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；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，兩次都沒有結果。第三次又派人去，並囑告訴盧漢說：『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，難道還不信任我？你到重慶來，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。』盧漢因為自己的叛逆尚未顯露，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，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。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，最後把他說服了。盧漢臨走的時候，父親又割切地囑咐他說：『國家的命運如何，就只看四川、雲南、貴州三省了。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，希望你們回去之後，好好努力，我去廣州的時候，再順道來看你。』

不久，父親要到昆明去，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，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，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。但是，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，總是要實踐對盧漢臨走時的諾言。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，我向父親建議：『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，讓我先去；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。』父親則於第二天早晨，從重慶動身，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，約盧漢相晤。』

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，我就啟程飛往昆明。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，就向他說明父親『恐不克即來昆明』的緣故；並且告訴他，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。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，並認為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。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，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。第二天上午九點鐘，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，於是找着了盧漢，告訴他：『重慶方面來了電報，總裁已經起飛，十點鐘就可以到達昆明機場。』我

告訴他這個消息之後，就與他寸步不離，他打電話派部隊到機場保護安全，我說：『用不着了，最安全的方法，就是除你、我兩人之外，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。』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，趕到機場。十點鐘，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在昆明機場，我以為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略談幾句話就走；可是，又出人意料之外，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，第一句就問：『盧主席，你有沒有預備午餐？』盧漢報告說：『還沒預備好。』父親說：『好！好！那我們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餐罷。』我聽了，父親的話，雖然無法阻止，可是已經坐立不安；心裏細想，父親身繫國家的安危，今已深入虎穴，萬一有了差池，國家前途何堪設想！然而那天，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慈祥 and 安定，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，還談了很久的話；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，約集了許多高級將領，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。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，我看看天氣不早，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；於是向父親報告說：『方才接到廣州的訊息，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，請父親立刻起程。』父親聽了我的報告，

站起身來，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，就說：『好了，我們走罷！』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，重到廣州。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，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叛逆，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。父親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威德，無形使他們懾服愧怍，結果安然無事。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，委實覺得『心有餘悸！』

到了十一月間，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，他自己却去了廣西，避不見面。那時共匪正向

西南急速進軍，重慶的淪陷，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。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，都遭拒絕。到了匪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，我又報告說：『匪軍已經到達南溫泉。』父親說：『我現在還不能走，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，處理完妥之後，才能行動。』我就沒法，只得去找羅廣文，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，同他一起來見父親。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的戰況，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；等到羅廣文走後，父親纔對我說：

「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，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，因為他到前線，是我派他去的；現在他打敗了，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。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，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？」

父親替部屬負責，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；那些臨陣脫逃的將領，真是罪通於天了！

當天下午四點鐘，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；那時，重慶市內紊亂不堪，人心惶惶，大有不可終日之概，各機關的人員，紛紛準備逃難，差不多都走空了。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，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裏面，只剩了幾名衛兵，還有兩位副官，其餘的人已跑得淨光。父親就對那位副官說：『你見到楊司令的時候，就報告他，說我已經來過這裏。』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，一路悲淒冷落的情況，難以形容。

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裏走了一遍，這間辦公室裏面的一桌一椅，一草一木，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。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；親物傷情，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，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，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。最後，看到壁上掛着一幅軍用地圖，就命我把它取下燒燬，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。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，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羣，水洩不通，汽車無法通過；父親祇好下車步行，走向寓所。

當晚，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慶的意思，很早就上床安睡。到了晚間九點鐘，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，我們覺得情況不佳，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，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；因為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，故即在機場內停留至翌晨，纔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。

到達成都以後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，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，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，準備與匪軍作「背城借一」的最後決戰；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。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，那位身為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，竟然躲藏起來，避不露面；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縉緒去找他，也不肯出來。最後，父親只好對王縉緒說：『你去告訴劉文輝，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，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，就算我今天死了，也是應該來送葬的。』可是，王縉緒從劉文輝那裏回來以後，祇是搖頭嘆息，向父親報告說：『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，他家裏盡是些古怪的人。』意思是說：在劉文輝家裏看到了許多所謂『民主人士』，共

匪、失意軍人、官僚政客，他們正在準備『靠攏』投匪了。

不久之後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，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却聯絡；翌日，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外的復通了，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，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：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，以便做『人民政府』的『第一大功臣』。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。臨行的時候，侍衛人員對父親說：『劉文輝的便衣人員，已經佈滿了軍校大門附近，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。』但是父親却拒絕了他們的建議，嚴正地說：『我從那個門進來，也要從那個門出去！』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，還是從容不迫，絲毫不肯苟且的！

三十八年底，我奉命到西昌去，臨走的時候，父親對我說：

『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，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，選擇最有意義的死。』

父親又說：

『你告訴他們，如果臺灣不保，我是決不會走的！』

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，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；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，也應該抱『殺身成仁』的決心，與西昌共存亡。我的任務完畢，就由西昌飛經海南島，回臺灣覆命。

這一年，也就是美國政府發表『白皮書』的一年。當該項文件發表時，很多人主張請父親

對『白皮書』裏所說的話，根據事實加以答辯。可是，父親很安然地說『不必了！』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：

「耶穌被審判的時候，他是冤枉的；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。」

沉默是最好的答覆。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，共匪在大陸的殘暴屠殺，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；一切一切的鐵的事實，還不都是替我們作『義務的辯護』嗎？

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，父親復職了，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『受命於危難之間』。到了五月，國軍自舟山撤退，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棄舟山，會引起臺灣人心的不安，並使大陸同胞失望，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；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劃，後來，父親向大家說：『你們恐怕因為舟山撤退，就會使得臺灣人心不安，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，臺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？你們又恐怕因為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，但是如果爲了要守舟山而臺灣不保，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？』第二天，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。我們想起來，如果不是父親力排衆議，當機立斷，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，恐怕早已不存在了。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：

「中國人應該有雄偉的氣魄。」

又說：

「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，是要向大處看

，向遠處看，從高處看。」

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，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！

父親自三十八年初，第三次下野以來，一直到了舟山撤退為止，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；然而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，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。自此之後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新的曙光，又走上『中興』道路。父親說：

「『中興』比任何創業更難，因為『中興』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，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，從廢墟中奠基再造；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，來重新建立自信，更是要從被擊敗者的敵人手中，回轉頭來擊敗敵人。」

古人說：『殷憂啓聖，多難興邦。』我們應該抱着『乘長風破萬里浪』的精神，冒險犯難，向中興大業的前途邁進！

## 贈書

贈與中外雜誌讀者  
。請附郵票四元寫  
明收件人地址、姓

名，由本社寄贈黃正銘教授著戰時  
國際公法一冊。